

YANJIUSHENG LUNTAN 2006

研究生论坛2006

哲学·历史学卷

《安徽大学学报》编辑部 编



安徽大学出版社

YANJIUSHENG LUNTAN 2006

研究生论坛2006

哲学·历史学卷

《安徽大学学报》编辑部 编

安徽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研究生论坛:2006. 哲学、历史学卷/安徽大学学报编辑部编.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4
ISBN 978-7-81110-300-7

I. 研... II. 安...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②哲学—文集
③史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54569 号

研究生论坛 2006

哲学·历史学卷

安徽大学学报编辑部 编

出版发行 安徽大学出版社
(合肥市肥西路3号 邮编230039)
联系电话 编辑室 0551-5108468
发行部 0551-5107784
电子信箱 ahdxcchps@mail.hf.ah.cn
责任编辑 张朝胜 杨国平
封面设计 孟献辉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合肥现代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1/16 880×1230
印 张 97.875
字 数 3836 千
版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1110-300-7

定价 200.00 元(全四册)

如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目 录

【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原理】

论科学发展观的哲学意蕴和实践意义	张小君 (1)
论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科学发展观	谢志燕 (4)
回到马克思发展马克思初探	李晓明 (7)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几点思考	张路生 (10)
《实践论》中逻辑思维方法之浅析	耿 侯 (13)
马克思主义与构建和谐文化的关系	郑淑婷 (15)
从劳动解放理论看和谐劳动的构建	汪永生 (17)
和谐意识的现代阐释	陈火青 (19)
异化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梁海天 (23)
论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韩九琴 (25)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现实的人”的解读	王 娅 (28)
人的本质之我见	张 洁 (30)
简论人性与人的本质的关系	李卫杰 (33)
自觉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苏新骞 (36)
试论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张恩志 (38)
民族文化交流的哲学思考	顾妮娜 (40)
网络发展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刘奔前 (42)
论虚拟哲学、网络哲学的同与异	黄华松 (45)
游走于虚拟与现实之间	张 伟 (47)

【中国哲学与中西哲学比较】

《论语》中的交往原则及其社会意义	曹 俊 (50)
略论汉初儒学的发展与兴起	郭 蕾 (52)
《老子》辩证法思想及其影响	姚庆华 (55)
浅论老子的“柔弱胜刚强”	石丽娟 (57)
老子为道教所用的内因	朱志远 (59)
“梦”里观庄子	陈 启 (62)
论庄子的人生观	姚 娟 (64)
道教生命观意蕴之浅析	崔 俊 (66)
庄子生命观解析	周 青 (68)
浅析唐代道教发展的原因	任晓曼 (70)

浅谈佛教思想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特征	王 蓓 (72)
儒学、佛教与东晋南北朝道教改革	刘小星 (75)
老子与赫拉克利特辩证思想比较研究	王 超 (77)
道家视域里的荷尔德林	蒯 群 (79)
“灵魂”与“游魂”	何光辉 (82)
李贽与尼采	盛敏理 (84)

【外国哲学】

从古希腊神话到早期自然哲学的内在逻辑及启示	魏献玲 (87)
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幸福观	李 琮 (90)
亚里士多德关于理想社会的构建	孙 军 (93)
试论《政治学》中的正义观	张 弢 (96)
浅析亚里士多德的中庸伦理观	李 蓉 (99)
浅析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论争	汪家耀 (101)
笛卡儿身心二元论思想	龙书贵 (104)
浅析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的自由与法的内涵	彭 辉 (106)
浅谈西方近代哲学层面的人性问题	许 姗 (109)
“医生式”的哲学家——尼采	李艳峰 (112)
浅论尼采哲学中的酒神精神与悲剧精神	王国勇 (115)
略论法兰克福学派的消费异化理论	姚 瑶 (118)
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之我见	高乔楠 (121)
理性的重构	梁 立 (124)
析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没有历史”	谈有红 (127)
存在主义与波伏娃的女性主义哲学	李方备 (129)

【美 学】

审美与生活同行	方华中 (131)
从“以人为本”角度透视当代美育	孟晚耕 (134)
“心理距离”说与审美“无利害”	董 梅 (137)
一门建设发展中的学科——文艺美学	俞 娟 (139)
从美学意义对两性关系的探讨	付丽丽 (141)
先秦儒家美学：仁之美	张剑波 (144)
孔子音乐美论思想之浅析	徐 耀 (146)
“仁”与孔子美学	徐 卉 (148)
浅谈大观园的造境艺术	施海英 (150)
杨家埠木版年画的题材内容与风俗民情	毕凤霞 (153)
论魏延的性格悲剧	袁恒杨 (157)
论苏轼词的悲剧意识	黄宗文 (159)
哀而不伤，乐而不淫	陈书华 (162)

席勒美学思想初探	李卫国 (165)
马尔库塞的新感性与李泽厚的新感性	李锐锋 (168)
追求与幻灭	吴衍发 (171)

【史学史与史学理论】

浅论《战国策》的历史思想	路则权 (174)
从《史通》看刘知幾的思想特色	贺正丽 (177)
钱文选《钱氏家乘》简论	邓一飞 (180)
论杜佑《通典·礼典》的史学成就	张灵利 (183)
《新五代史》与“《春秋》义例”	张经亮 (186)
论《灾祥略》的史学价值	李 芹 (189)
《明史·艺文志》研究综述	陶保杰 (191)
论 20 世纪 40 年代初陈垣史学思想与成就	赵宝先 (194)
略谈商务印书馆和中国近代史学	黄 蕾 (197)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研究综述	李 丹 (200)

【考古·文献】

皖南早期青铜工业遗产的发现与研究意义	冯 伟 (203)
试论殷墟青铜礼器明器化倾向	吴 琳 (206)
论张舜徽辨伪学的学术研究	王慧东 (209)
王应麟《困学纪闻》校勘方法举隅	杨万兵 (212)

【思想文化史】

试论炎帝时代的道德状况及传统美德	卢东磊 (215)
浅论“轴心时代”的诸子学说	李忠萍 (219)
略论《管子》的人才思想	孙永利 (222)
从血缘关系看孔子“仁”的思想的产生	许晓艳 (225)
孔子与墨子教育思想之异同及启示	侯宗华 (228)
齐文化研究现状和现实意义	姚原野 (231)
通过颜文姜传说浅谈博山孝文化	于 斐 (234)
简析《国语》军事思想	王寒冬 (237)
《孙子兵法》与人事管理的“分身术”	张 博 (241)
知人论世话《论衡》	李 强 (245)
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乐舞的东传	闫江涌 (248)
孙诒让政治思想考	程 军 (251)
五四时期陈独秀新闻自由思想探讨	刘 峰 (254)
胡适留美早期对日态度浅析	李崇德 (256)
简论胡适留美期间对国际关系相关问题的认识	张 健 (259)
胡适与基督教	许道才 (262)

启蒙精神与社会普及	吴丽娅 (265)
浅论传统孝文化的现实意义	秦东华 (268)
浅论中国历史上的私学	呼庆伟 (271)
中国社会转型在当代大众审美中的体现	郭 奇 (274)
浅谈徐悲鸿写实主义绘画思想产生的历史原因和时代背景	焦 杨 (277)
试论历史的“屏幕”化	柏 晴 (281)

【经济史】

从居延汉简看居延屯戍区的商业活动	毛玉兰, 邵中技 (284)
论清初山东农业生产的恢复及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曲伟强 (286)
徽州宗族公产初探	胡 俊 (289)
试论近代安徽祁门地区的茶叶改良	徐 惠 (292)
济南开埠与清末济南社会变迁	张 玲 (295)
包世臣及其实政思想浅述	刘 峰 (301)
论汪康年的商业思想	李 宁 (305)
王韬农业思想考察	杨波峰 (308)
廖仲恺经济思想初探	宋忠伟 (311)
略论北洋政府时期青岛的市政建设	徐宏英 (313)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时人对银行投资农村的思考	程春晖 (317)

【人物·现代史】

论吕蒙	闫高峰 (320)
康有为研究综述	张小孔 (323)
姚锡光与皖省地方行政	詹灵杰 (326)
梁漱溟教育思想与当代中国教育的和谐发展	李 明 (329)
冯玉祥追蒋“清党反共”的原因浅析	李常银 (331)
抗战期间外国人及民主人士对陕甘宁边区的观察	宋 青 (334)
抗战时期新桂系主皖基本措施及特点	陈萧然 (338)

【近现代中外关系史】

清政府在日俄战争期间的“局外中立”	黄胜桥 (341)
略论英租威海卫时期的政治控制	郭志强 (344)
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原因新论	黄文治 (347)
北洋政府与“二十一条”交涉	张同侠 (350)
浅析美国对“九一八”事变的初期反应	赵金金 (353)
评 1926 年英国对华“新政策”	鄢洪峰 (356)
论九一八事变后顾维钧的外交策略	陈积敏 (359)

论科学发展观的哲学意蕴和实践意义

张小君

一、科学发展观的哲学意蕴

(一)唯物史观是科学发展观的哲学基础。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之所以称为“科学发展观”,就在于它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力求尊重、认识和运用客观规律,来谋求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健康和持续发展,以造福全体人民。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历史观和社会形态观所揭示的,分别是世界发展的普遍规律,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和特定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因而由此构成三个层次的发展观。用以指导我国改革、建设和发展的客观规律体系,就至少包括关于世界发展的普遍规律、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和关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特殊规律,并且被包含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层次的发展观之中。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关于整个人类社会的科学发展观。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像自然发展一样,有它自己的内在规律”。^{[1]389}“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1]776}形成了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作为根本基础、以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作为根本动力、以社会形态的发展和更替作为历史演进过程的社会发展观。马克思由于把现代唯物主义贯彻到底,即把他对自然界的认识,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而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2]是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和历史总趋势的科学发展观。这种科学发展观中所内蕴和要求的唯物史观与历史辩证法的统一,对于我们观察、认识、解释和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具有广泛的哲学方法论的功能和指导意义。

唯物史观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中介环节,是特定社会的,例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最切近的哲学基础。马克思正是因为有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这“两大发现”的结合,才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到科学。而在当代中国,我们党也只有坚持运用唯物史观,来指导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转化为社会建设、社会发展的实践,才能真正树立和落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发展观。因此唯物史观是我们党提出和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最切近的哲学基础。

(二)坚持“以人为本”,确定人的发展是唯物史观的基本价值维度。“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十六届三中全会对“科学发展观”的概括。十六届五中全会又明确把加强和谐社会建设作为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六个必须的原则之一,指出:“促进社会和谐是我国发展的重

要目标和必要条件,”强调“要按照以人为本的要求,从解决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入手,更加注重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加强发展社会事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由此可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它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价值论的高度回答了“发展为谁”、“发展靠谁”以及“发展成果由谁享”这样一个核心问题,从而确立了“发展”的价值目标。胡锦涛在阐述“以人为本”时明确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就十分清楚地阐明了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价值目标。因此,认识和确立“以人为本”,对于深刻认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和精神实质至关重要,进而也是关系到能否树立和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以人为本”中的“人”,应当是具体的人、历史的人和社会的人。所谓“具体的人”其义有三:一是“有生命的个人”、“有血有肉的人”、“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这是“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3]二是作为“社会存在的人”,是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特别是一定的经济关系中的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1]24}三是在阶级社会中,人是作为一定阶级和阶层的成员而存在和活动的。我认为,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的“以人为本”中的“人”完全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对人的这种规定和理解。因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是一个有机整体,不能把“以人为本”从中割裂、抽取出来,加以任意的发挥和泛化,否则就离开了“科学发展观”的原意。既然这个“科学发展观”不是世界观和历史观意义上的发展观,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观,那么这里讲的“人”,就只能是在当今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人。

对“以人为本”这一价值论的解读,完全符合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和发展是衡量社会进步的重要尺度的思想。马克思曾把人类社会结构的发展分为三种形态或三个阶段:“人的依赖关系”是第一大形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阶段。”这里,马克思把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归结为社会结构和人的发展,实际上指出了“人”的发展三种形态,它既超越了人对人的依赖关系,又超越了对“物的依赖性”,从而使“人的独立性”提升为“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以人为本”的实质是以人为目的,即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目标。同时“人”作为社会历史运动的主体,是实践的人,而实践是人的实践;正是“作为既定的主体的人”以自己具体的实践创造着“现实的历史”。这就是说,人的实践或实践的人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以人为本”不仅概括了人是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而且还逻辑地包涵了人是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根本动力。总之,“以人为本”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价值论的高度规定了“发展为谁”、“发展靠谁”、“发展成果由谁享”这样一个核心内容。

二、坚持运用唯物辩证的科学方法论领会和树立科学发展观

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是关于“科学发展观”的完整表述。其中,“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涵义,则是指应当“如何发展”,即发展本身的本质特点和指导发展的方法论。因此,我认为,只有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既唯物、又辩证的方法论原则,才能有助于我们正确领会和自觉树立科学发展观,并更好地用以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进步,推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

“全面发展”是针对、防止和克服“片面发展”而言的。所谓“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达到这种发展要求,需要多方面的综合条件。但仅就其方法论而言,我认为最为关键的是要在建设坚持历史唯物论和历史辩证法的统一。社会主义社会,也同任何其他社会一样,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整个社会发展进步的根本条件和根本动力,是“整个社会生活以及整个现实历史的基础”。^[4]而社会的政治、思想、文化和道德,只能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和繁荣起来。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观点。

“协调发展”,是针对、防止和克服地区行业间大单边独行、反差较大的“畸形发展”而言的。所谓“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协调发展”。由此看来,“协调发展”是指在坚持“五个统筹”的基础上,协调好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中各个方面和各个层次的关系。我认为,要统筹好这个发展的战略全局,就要把握住这种复杂多变的关系结构,就客观地需要借助唯物辩证法这门“普遍联系的科学”,坚持发展的重点论与发展的均衡论的统一。

“可持续发展”是针对、防止和克服无视自然条件和生态环境的制约,搞只顾眼前的竭泽而渔、激化人与自然关系的那种难以为继的“跨越式发展”而言的。所谓“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

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一代的永续发展”。可见,可持续发展是一种人与自然、现实与未来的一种协调发展。它要求我们坚持遵循社会发展规律与自然发展规律、社会辩证法与自然辩证法的统一。

三、科学发展观的实践意义

(一)科学发展观是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无疑着眼于解决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2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积累了不少矛盾和问题。这些问题必须高度重视而不可回避。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正是从考虑解决当前实际问题入手,在总结新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建设的历史经验,并充分吸取西方现代化和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一次新发展。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首次概括并达成全党共识的科学发展观,是对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所面临的发展这个最大的问题而提出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蕴涵着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的新回答。作为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集体智慧的结晶和中国人民50多年建设实践的经验总结,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独特贡献,无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史上,还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都具有不可低估的创新价值。

(二)科学发展观为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打开了理论通道。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的结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伟大创举。这一尝试不仅从理论上得到了正确的诠释,而且从实践中得到了有力的证明。同时,我们也在实践过程中深刻认识到,市场绝非万能,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如果仅仅依靠市场的自发作用,不但不可能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推进,而且也不可能妥善协调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利益矛盾。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为新世纪新阶段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打开了理论通道。当前的关键是继续深入探索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具体途径,进一步探索出二者优势互补、相得益彰的运行机制。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就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遵循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理念,我们应继续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健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的体制和机制,逐步建立健全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保障,确保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走出一条成功之路。

(三)科学发展观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新途径。科学发展观作为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无论在其发展本质、发展目的还是发展所依托的制度和体制方面,与西方发展观都存在根本区别。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是蕴涵社会主义发展主体、发展动力、发展目的的总体性

概念。它所明确的是社会主义的发展一定要充分尊重人民群众作为发展主体的历史地位,人民群众是发展的根本动力,人民的利益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所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所追求的最高目标。^[5]正如胡锦涛同志所强调的:“始终以提高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为发展的根本目的,使发展的成果惠及最广大人民,充分调动最广大人民投身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遵循人类社会发

展规律并依照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其本质就是要求经济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并为之提供切实的制度保障。

科学发展观由于具有较西方发展理念不可比拟的特殊优势,而呈现出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它的形成,既是对20多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对西方各种发展观念的一种历史性超越。作为昭示人类未来发展方向的思想旗帜,科学发展观必将为人类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 [2] 列宁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14.
-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7.
- [4]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04.
- [5] 朱贻庭. “以人为本”与科学发展观[J]. 毛泽东邓小平研究,2006(1):6-10.

作者:安徽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导师:许俊达

责任编辑:林一哲

论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科学发展观

谢志燕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这一论断是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学科性质、实践价值的准确定位。它要求我们从哲学世界观的高度把握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从方法论的层面认识科学发展观对于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的指导意义。

一、科学发展观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意蕴

科学发展观是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理论,是新世纪新阶段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发展模式、发展道路、发展战略的理论体系。它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的领导集体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在总结了国内外关于发展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是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发展的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对发展问题的认识。

科学发展观解释了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的正确道路,是指导我们推进发展的根本方法。它着眼于丰富发展内涵、创新发展观念、开拓发展思路、破解发展难题,回答了关于什么是发展、为什么要发展、靠谁发展、为谁发展、如何发展等根本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这是世界观和方法论层面的科学发展观。一方面,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在当代中国发展问题上的运用和发展,因而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特征和本质要求;另一方面,它又揭示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回答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成为指导当代中国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与新时期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相互作用,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战略相互贯通。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的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是对科学发展观理论精髓的高度概括,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政治立场、基本观点和普遍方法,因而科学发展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指针。

二、科学发展观所体现的中国特色

以人为本是当今的时代精神,实现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也是当今世界各国的共同追求。然而,当代中国发展实践和理论背景又赋予了科学发展观以特殊性。只有依据当代世界情势的变化和我国社会的特点,具

体地、历史地理解科学发展观,才能准确理解和全面把握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和根本要求。

首先,理论主题的特殊性。科学发展观是为解决发展问题而提出来的,但它不企图为世界的发展提供一劳永逸的方案,而是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提供发展理念和指导方法。当代中国具有特殊的国情,面临着特殊的发展问题。经济全球化与市场化、政治多极化与民主化、文化多样化及其相互激荡、社会知识化和信息化的 21 世纪的情势又赋予中国特殊国情和特殊问题以时代内涵。

当代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具有不同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非西方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这是提出、研究和解决当代中国发展问题的制度前提。中国是一个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经济的增长、民主政治的发展、文化的繁荣和社会的进步,都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逐步实现的,这是提出、研究和解决当代中国发展问题的基本体制前提。中国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不高,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经济与社会之间发展不平衡,承担着实现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双重任务,面临着提高效率和保持公平的两大难题,这是提出、研究和解决当代中国发展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中国又是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的东方文明大国,具有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和许多非西方欠发达国家的悠久的历史文化遗产,其中既有很多促进当代中国发展的积极因素,也有不少阻碍发展的消极因素,这是提出、研究和解决当代中国发展问题的历史前提。中国还是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不仅面临着巨大的人口压力,而且承担着节约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繁重任务,这是提出、研究和解决当代中国发展问题的人口前提和生态前提。就国际条件而言,信息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对中国来说既是发展的难得机遇,又是发展的巨大挑战,这是提出、研究和解决当代中国发展问题的国际环境。所有这些构成了当代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实现当代中国发展所必须提出、研究和解决的重大问题的特殊性。这些问题包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发展的关系问题;实施不平衡发展战略与实现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经济与社会之间、国内建设与对外开放之间的协调发展的关系问题;赶超式发展战略与实现经济、人口、资源、生态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的关系问题;在商品经济为基础的物化社会环境下实现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问题;改革开放过程中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制度在价值观上的冲突与整合

问题;信息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为当代中国发展所提供的机遇、挑战以及我们的对策问题。归根到底,要求我们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提出、研究和解决在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如何实现又快又好发展的的问题。这是当今中国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科学发展观及其哲学需要创造性地回答的问题。^[1]

其次,理论基础的特殊性。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不仅在于它是对时代课题的科学回答,而且在于它有科学的理论基础。从根本上说,科学发展观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是对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同时,它也是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发展的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科学发展观蕴涵了诸如社会发展是客观性与主体性的统一、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人民群众是社会的主人和历史的创造者等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以及全面的观点、对立统一的矛盾观点、发展的观点等辩证法思想,同时又赋予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发展的基本思想以新的内涵。从毛泽东多快好省的发展理念到邓小平的“发展是硬道理”,从江泽民同志的“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到胡锦涛总书记的实现“又快又好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既一脉相承,又不断创新。如果说,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发展观的一般理论基础,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理论成果就构成了科学发展观的直接理论基础。双重理论基础既规定了科学发展观的马克思主义性质,又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成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

再次,理论内容的特殊性。科学发展观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等关于发展的特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过大量的论述,我们党的三代领导集体也提出过一些重要思想,但把这些方面联系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而提出,并作为指导发展必须长期坚持的思想,则是第一次。科学发展观是对传统发展理论的借鉴与超越,它注重经济、政治、社会、人和自然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全面突破了以物为中心的传统发展观的狭隘视界。科学发展观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又是社会主义的发展观,因为它既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又用科学的发展观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无论是坚持以人为本,还是强调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都是针对改革开放以来着重发展经济以解决人民温饱问题和实行不平衡发展战略而逐渐积累的矛盾与问题的,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性。离开当代中国的发展阶段和发展实践,就不能深刻认识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及其重大意义。

最后,理论价值的特殊性。理论发源于实践,又为实践服务。科学发展观是对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对新世纪新阶段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的深刻反思和科学回答,是指导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思想武器。科学发展观是当

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创造,它产生的土壤是当代中国实践,发挥作用的舞台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有力地推动着我们党发展理念的根本变化、发展思路的根本革新、发展模式的根本转换、发展战略的根本转变,标志着我们党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科学发展观规范着当代中国的发展实践,要求我们既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又要花更大的力气发展社会事业,使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相互协调、相互促进;要求我们在继续注重效率、提高生产力总量的同时,更加注重解决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穷者更穷、富者更富的“马太效应”问题,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要求我们在继续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合法经营和诚实劳动先发展起来、先富起来的同时,更加积极地扶持落后地区的发展,解决困难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要求我们既要按照经济和社会规律实现发展,又要坚持以人为本,使发展的成果惠及最广大人民群众;要求我们既要发展经济和社会事业,又要保护生态环境,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为后代人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科学发展观的这些理论认识功能 and 实践导向功能完全根植于中国大地,是以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为根据、以当代中国发展面临的问题和矛盾为指向、以实现、发展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归依的。因此,科学发展观是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又快又好发展的“革命的代数学”和“最锐利武器”。

三、科学发展观的世界历史意义

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当代中国发展实践的先进理论。科学发展观的先进性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其强烈的时代性。科学发展观牢牢把握时代主题,充分反映时代特征,用理论与实践的新成果满足时代需要,推动时代进步。

首先,科学发展观所面临的问题具有世界性背景。环境问题、能源问题、人口问题、贫富分化问题、发展不平衡问题等都是工业化以来世界各国都普遍存在并加以解决的问题。二战之后,世界各国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快速发展经济,提高生产力水平,解除贫困状态,增强综合国力,因而发展被归结为“GDP”增长。在这种背景下,多数国家所确立的发展战略都是以经济增长为首要目标。对于中国来说,“发展是硬道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等主流话语的提出表明了中国采取的也是一种经济优先的发展战略。经济优先发展战略对于经济落后国家尽快摆脱贫穷,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这是一种粗放型经济发展战略,它一方面以资源的浪费性消耗和环境的破坏为代价,另一方面又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造成贫富两极分化的严重社会问题。这些代价和问题在一定时期内是社会能够承受、人民能够容忍的,但一旦超过一定限度,必然造成社会的动荡,经济增长的中断。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和政府对于这种被称为“拉美式陷阱”的现象及其相应的发展观进行反思,反思的最新成果就是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直接针对的是当代中国发

展进程中出现的问题,但中国的发展问题也是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中的难题,因而科学发展观所提出、研究、解决的问题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世界的,是“全球性问题”在中国的具体表现。

其次,科学发展观的实践具有世界性影响。当代中国科学发展实践具有世界性影响。对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的条件下实现跨越式发展,并避免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环境、能源危机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贫富极端分化和社会动荡的局面,马克思主义教科书里没有现成的答案,世界上也没有成功的模式,一切都要靠我们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科学发展观意识到了发展不仅仅是“GDP”的增长,而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应该逐步把“绿色 GDP”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当今世界各国的竞争不仅仅是经济发展这种硬实力的竞争,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和影响,也绝不仅仅是由经济和军事实力所决定,很大的程度也取决于软实力,即文化、道德、国家形象和感召力、凝聚力等。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兼顾了软实力和硬实力,力图探索出一条低投入、高产出、低消耗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可持续发展的新的发展道路。这条新的发展道路不仅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必需,也将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重要借鉴。科学发展观提出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努力实现和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和平的发展就是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己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开放的发展就是中国在主要依靠自身力量和改革创新实现发展的同时进一步加大开放力度,积极参与世界经济交往与合作;合作的发展就是同世界各国广泛开展合作与

交流,积极参与制定和实施国际经济贸易规则,通过平等对话和协商解决合作中出现的分歧和问题,努力实现互利共赢。和平是世界繁荣发展的前提,发展是维持世界和平的保障,合作是实现共同发展的途径。和平、开放、合作的发展观是顺应世界大势的,是符合世界人民利益的,因而对中国和世界都具有现实意义。

最后,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成果具有世界性意义。从经济发展观到社会发展观到可持续发展观,再到科学发展观,这是人类对于发展问题研究和探索的基本轨迹,也是人类对于发展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化过程。科学发展观的重大理论价值在于:直面人类在 21 世纪面临的全球问题和当代中国发展出现的重大问题,整合人类关于发展问题的优秀成果,从社会与人的统一、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统一、人类社会发展与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的统一上建构了一个整体的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整体性特征适应了经济全球化的世界形势,反映了人类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之间既分化又整合的特点,也体现了人的发展从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转变为追求经济利益、政治权利、社会公正、文化素养的全面发展的人的历史趋势。科学发展观所蕴涵的这种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的深刻内涵,代表了新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标示着人类自我认识的深化,在发展研究上具有世界性意义。

总之,科学发展观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上的运用和拓展。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我们必须坚持学习和运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各项工作,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从而实现经济社会的又快又好发展。^[2]

参考文献:

- [1] 吴家华. 关于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对策的哲学思考[J]. 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 2(14): 123 - 129.
- [2]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 科学发展观学习读本[M]. 北京: 学习出版社, 2006: 14 - 17.

作者: 安徽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 导师: 吴家华

责任编辑: 林一哲

回到马克思发展马克思初探

李晓明

一、回到马克思与发展马克思的内涵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集科学性、革命性于一体的科学,也是向人类文明成果开放的一个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不墨守陈规、固步自封,不把自己看作是万世不变的终极真理,其最大的生命力就在于它能够在实践中不断地创新。马克思恩格斯把自己的哲学称之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1]48}从历史上看,马克思主义帮助我们完成了对于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问题的重新定位;从现实上看,信仰危机、理想失落已成为摆在21世纪人类面前的全球性问题,人类呼唤新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是人类运用自己的理性思维和实践创造力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力量源泉。马克思认为:“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19}经过实践检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马克思主义,而且必须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正确了解回到马克思与发展马克思的内涵,把握二者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必要的,是深入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前提。

在唯物辩证法视野中,回到马克思的第一层涵义主要是通过深入研究马克思经典著作,研究其对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分析批判,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考察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探讨中的思想,真实地呈现马克思思想的全貌。研究文本的目的绝对不是要寻找和凝固一种僵化的本真教义,简单地照搬照抄马克思的原话,用本本教条套用现实,而是要从现实存在的客观实际出发,用马克思的科学批判精神,坚持马克思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用马克思没有说过而又符合时代特征、客观实际的新话,去解决现实问题。第二层涵义是重新理解马克思,讨论马克思之当代性的历史合法性前提。马克思不可能为解决他去世后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这说明马克思的当代性价值不是“现成”的,需要通过“回到”历史,理解历史,在此基础上才能重新“生成”。回到马克思是深化问题认识的方法,是实现经典语境和当代语境融合的途径。回到马克思的过程乃是通过历史的马克思的正确理解而实现对马克思当代性价值的正确认识的过程。

在认识论的视野中,“回到马克思”的第一层涵义是:马克思的思想是绝对真理,马克思已经为后人提供了解决各种问题的方案,提供了万能的灵丹妙药,我们只要照着马克思说的去做就行了。在这一意义上,我们不能同意“回到马克思”。只在认识论视野中的第一层涵义上讲“回到马克思”,是阻碍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在认识论的视野中看“回到马克思”,我们还可能看到另一层涵义,就

是“回到真理”。面对新的时代,新的理论层出不穷!在此涵义上讲“回到马克思”,却是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相一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这个命题,就是回到马克思的结果,是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而回到马克思的实事求是的精神的结果。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目的,不是为了“新”而是为了“真”。从本质上说,只有“真”的理论才真正是新的理论。所以,回到马克思的真理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是统一的追求真理的过程。

在价值观的视野中,“回到马克思”的涵义是回到马克思的价值追求,回到马克思的阶级立场。马克思的立场是无产阶级的立场,他的根本的价值目标是代表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实现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也就是根本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消除异化,达到人类的自由全面的发展。马克思的理论是和他的价值追求相一致的,他的理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不接受马克思的立场,从根本上说就不能接受马克思的理论,也谈不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反过来说,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必须是为了实现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为了彻底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的,而不能是为了维护私有制、维护某些人的特殊利益的。^[2]

发展马克思首先是指人们必须随着时间的推移、矛盾的展开和认识的深化,不断地改变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原理、观点,抛弃原来不完全乃至不正确的认识;不断地用群众实践的新经验、新知识来补充自己,用新结论、新原理来代替某些旧的、过时的原理和理论。发展马克思的第二层涵义主要是通过深入研究当代社会实践、科学技术发展和思想文化发展中提出的一系列时代难题,提倡因地制宜,创造性地提出解决时代课题的新方法,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新发展,以便进一步指导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活动。

回到马克思与发展马克思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二者是内在统一、不可分割的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是继承和超越的关系。如果不掌握理论发展的历史,不掌握前人提供的思想材料,即使进行再多的实践活动,也丝毫不能把理论推向前进。“回到马克思”是手段,“发展马克思”是目的。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应该是重在继承,贵在超越。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与时俱进的理论,我们既不能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书本上原地踏步,裹足不前;也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奠定的基础,另立门户,另起炉灶。我们必须把二者结合起来,这样才能不断地推进理论的发展,更有效地解决实践中遇到的各种重大问题。

二、回到马克思与发展马克思的意义

人是世界的主体,是它赋予自然界以意义,并推动自然界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人是会思考,有理性,善选择,谋创新的动物,在本性上崇尚自由,追求自由。在当今世界,自由深入人心。马克思主义正是指导人类为自由而奋斗。只要人类追求自由的精神长存,则马克思主义永恒发展!^[3]

回到马克思与发展马克思是消除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等错误理论的需要。纵观马克思主义在我国传播和发展的整个过程,有两种错误倾向始终纠缠我们:一种是教条主义倾向,即撇开中国的实际和当代重大社会问题来教条式地谈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主义者割裂了马克思主义的各个部分和各个发展阶段的内在联系,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语言奉为“天朝圣旨”,而不是“行动的指南”。另一种是经验主义倾向,即撇开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经验式地谈论中国的实际和当代社会的重大历史问题。经验主义者切割了事物的普遍联系,缺乏对整个世界历史时代和中国整个发展规律的认识,否认从时代的高度和中国社会发展规律来研究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世纪之交,国际形势和人类社会发生巨大变化和重大转折,整个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衰成败——尤其是苏东剧变这样的重大事件,使人们不能不反思马克思主义,不得不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来分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有关的重大前沿问题。在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经历了两种错误倾向的影响,经历信仰危机,尤其是近年来关于所有制、劳动价值论等问题的争论,促使人们认识到必须回到马克思,对马克思、恩格斯学说重新考察,同时也包括对马克思、恩格斯所处时代物质和精神条件的重新认识,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现代社会,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来解决实践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回到马克思与发展马克思是克服这两种错误倾向,运用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的指南,来指导社会实践,解决重大社会问题的理论钥匙。

回到马克思与发展马克思是社会主义社会和谐稳定的需要。一方面,随着我国加入WTO,经济全球化愈来愈直接参与我们日常生活世界的构成,带来了意识形态渗透与反渗透之间斗争的加剧,西方社会所鼓吹的意识形态终结论,意识形态多元论,意识形态全球化等思潮,其实质都是要求中国放弃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另一方面,国内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对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产生并将继续产生深刻的影响。如经济领域多种经济成分的同时并存和共同发展,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多种文化与多种思想的并存和相互作用,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由于上述国内外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意识形态面临严峻的挑战。怎样迎接挑战,在挑战中寻找发展的机会,是我们目前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时代课题。马克思主义能指导人们正确认识并看待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社会主义运动过程中的

暂时挫折,并坚信社会主义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和统帅,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思想基础,它可以引导人们正确看待个人、社会和集体三者的关系,并引导人们在社会和集体中正确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它在调控社会运行,保证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稳定,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等方面都起着并将继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当实践的迅速发展所提出的许多新课题需要面对和解决时,当发展的挑战与压力无情地摆在我们面前之际,发展马克思显得尤为突出和必要。

回到马克思与发展马克思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需要。一个民族不能没有哲学。马克思指出,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在当代中国,全球化进程在加速发展,经济的相对发展表明了精神文明的重要,时代课题的解决须要哲学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我们需要那些具有引导力量,体现民族品质的信念和原则的民族精神,这些民族精神的获得只能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胸襟、视野和方法去批判地吸收传统精神和其他民族精神中的优秀部分,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和民族化来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认为世界是运动变化的,而且也把自身看成是不断生成、开放的系统。它在强调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提倡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因为离开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就是胡思乱想;离开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就失去规范;离开实事求是,开拓创新就成了“怎么都行”。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转化必须坚持二者相结合,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尤其是对马克思本人的经典著作的解读,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的借鉴和融合;同时继续进行温故而知新和吸收借鉴工作,逐步展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成果,完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转化。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它必须在实践的发展中作富有生命的变动和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只有当物按人的方式同人发生关系时,我才能在实践上按人的方式同物发生关系”,^[4]其所谓“按人的方式同人发生关系”,就是按照主体人的内在尺度理解和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所谓“按人的方式同物发生关系”,就是主体人通过实践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

三、回到马克思与发展马克思的路径

首先,要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倾向,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批判精神完整地再现于当代,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我们行动的指南,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的结合。发展马克思最有效的途径是从时代精神出发,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本土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和我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并获得“一定民族形式”的具体过程。因此,发展马克思,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土化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文化的结合或融合。按照恩格斯的说法,每个国家运用马克思主义,

都必须穿起本民族的服装。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获得新的丰富内容和新的发展的过程。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从事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具体实际和需要出发,去阐释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而且要通过对中国民族的优良传统的深入发掘,来实现和丰富马克思主义,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从内容到形式都真正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使它不仅以“国家意识”的政治身份,同时还以“民众的心理意识”的文化身份展现在我们面前,从而实现完全意义上的结合。

其次,要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系统研读。忽视对文本的系统研读,必然导致理论的偏差乃至实践的偏差,进而不能有效地解决时代课题。对文本的解读,要根据对文本写作的原始状况的考证和相关资料的总体把握而提炼和阐释其思想。第一,要认真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自身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来理解他们的思想,而不是用后人的、别人的思想去解读他们的思想,这样才能防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变形;第二,解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要根据当时所处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而不是用现在已经变化了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来理解,这样才能防止曲解马克思主义的真实思想;第三,解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要把不同时期的思想联系起来看,既要看到他们的联系,也

要看到他们的差别,更要看到不同经典作家的思想之间存在的继承、发展和补充的关系,这样才能防止陷入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的对立,防止陷入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对立。

最后,在实践中,结合时代所提出的重大社会问题去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与时俱进的哲学,其思想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时代需要发展马克思,发展马克思离不开时代,要真正发展马克思必须以时代和当代中国实践为立足点,既要善于从当代世界的社会发展、科技革命的最新成果中吸收营养,从西方哲学、人文社会科学中吸收新的思想成果,用发展较成熟的西方哲学话语系统地挖掘马克思哲学中所蕴含的丰富、深刻的思想,同时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去分析、批判和清理现当代西方哲学中一些消极、含混的倾向;又要从中国哲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鲜实践中汲取源头活水,继承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吸收回到马克思的研究中取得的新成果并不断地加以运用,解决实践课题。

总之,理论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它与现实具有无法割断的联系。离开时代,离开现实,既无法理解理论的内容,也难以促进理论的发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要体现其时代性和开放性,使马克思主义永远绽放真理的光芒。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2] 王金福. 回到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J]. 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社科总论,2006(1):20.
- [3] 刘晨晔. 为什么马克思在当今社会依然在场[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4):124.
-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4.

作者:安徽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导师:郑明珍

责任编辑:林一哲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几点思考

张路生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特别是在中国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深刻社会变革的时期,这一问题更值得我们去深思、研究和探讨。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涵义

研究者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内涵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社会实践及传统哲学相结合,在指导中国革命、改革和建设过程中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过程。不过,在具体理解上,学界有不同看法。

最早提倡把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大众化并取得重大成就的著名学者艾思奇认为,哲学在本质上是属于全体人民的智慧,而不应是某些少数人的专利。它产生于实践,理应由广大人民群众掌握。因为只有这样,哲学才能变成指导社会变革的物质力量。他指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中,“马克思主义者所谓的精通马克思主义不仅是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而同时是指要能在一定的具体环境之下实践马克思主义。在一定国家的特殊条件之下来进行创造马克思主义的事业。”^[1]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内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一人,也是探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思想路径获得伟大成功的第一人。早在1938年,毛泽东就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这一重要命题,实际上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深入发展,近年来,有的学者从政治、学术层面区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还有的从意识形态和文化层面以及解释学的角度来理解和诠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虽然学界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研究和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涵义,但是,我以为,要准确完整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概念的涵义,首先要对其进行语义学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关键词是“化”字,“化”什么,怎样化?即马克思主义哲学被中国所化,既为中国传统文化所化,又为中国革命建设的实践所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并不就是简单的马克思主义化,其重点不是“走向马克思”或“回到马克思”,而是“马克思走向当代中国”;不是中国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化或马克思的哲学化,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或马克思哲学的中国化,不能本末倒置。

其次要明确“化”的内涵。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并不像自然科学那样直接为我们所用,全盘搬来,照搬照抄,而是需要经历一个“化”的过程,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

的革命、改革和建设实践中得以消化、吸收、利用的过程,这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丰富和发展的过程;同时,“化”的过程包含着一种价值选择,即“化”的主体总是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对象中有价值的部分而化之。化只能化其可化者,而不能化其不可化者。对于这一点,马克思早有论述: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取决于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同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要正确把握‘化’的程度、层次,不必苛求全面化;也要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西方化、俄国化等等现象,不必动辄付之以意识形态上的指责和批评”。^[2]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是研究和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必然要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充满争议的复杂问题。

第一,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的互补性阐述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应正确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效不大的更为重要的主观原因是受教条主义的束缚,缺乏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的自觉性和使命感。我们承认“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但不能由此就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毫无遗漏地总结了世界各民族、各国家的智慧,世界各民族、各国家的哲学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证明”和“注释”。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直接理论来源的黑格尔哲学、费尔巴哈哲学基本不了解中国哲学。“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关注东方、关注中国革命,但他们对中国的历史、哲学、文化知之不多。他们研究、概括的主要是欧洲的文明成果。‘中国传统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之一’的说法是缺乏事实根据的”。^[3]

人类各民族、各国家的哲学思想既有共性的一面,又有个性的一面。我们承认中国哲学同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一致或相通的一面,但必须承认由于地域、民族、时代的不同,它们各有自己的优点和特点,它们之间有明显的差别。在哲学发展的形态上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先进于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有许多内容是中国哲学未能涉及到的或未曾展开的。但同时我们还要认识到,中国哲学宝库中也有不少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未能涉及到的或未曾展开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仅要把中国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相通或相似的优秀成果融入马克思主义哲学,还要把中国哲学中有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没有或未能展开的那些思想、观点、概念和范畴加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中。在这方面,毛泽东是我们学习的典范。如马克